

ZHENGZHIXUE
JICHULILUN DE
GUANNIAN

JIAZHI YU ZHISHI DE LUNBIAN

● 严 强 孔繁斌 著

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

价值与知识的论辩

● 中山大学出版社

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

——价值与知识的论辩

严 强 孔繁斌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价值与知识的论辩/严强,孔繁斌
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5

ISBN 7-306-01923-6

I. 政… II. ①严… ②孔… III. 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463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6003)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发行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韶关新华北路 50 号 邮编:512026 电话:0751-8760690)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41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政治学从古代到近代的三个轴心发展时期，都坚持以深刻的哲理分析、执着的价值追求、缜密的规范论证为其基础理论支撑。然而在现代政治科学研究中，这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削弱已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缺陷。基于这一知识状况，本书以政治科学的基础理论为核心论域，在感悟人类的政治实践和释读政治学经典的基础上，以当代思想和思维水平为支持，批判性地系统阐述了基础理论研究在政治知识求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涉及政治科学的学科论、范式论、方法论和范畴论四个论题，指出回归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当今政治科学繁荣的根本途径。

本书论题的公共性和论辩的开放性，不仅为社会科学专业人士，也为此有兴致的公共管理精英和公民群体介入研讨提供了一个理性交流的知识平台。本书亦适合高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专业作教材作用。

目 录

导论 政治科学的基础理论观念

第一章 政治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与结果	(3)
一 政治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	(3)
古希腊的形式理性	(3)
轴心时期基础理论的展开	(10)
传统的当代争论	(14)
二 政治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两个价值命题	(17)
价值命题 A: 轻视基础理论研究导致政治 科学合法性衰减	(17)
矫枉过正的行为主义	(17)
从知识乌托邦到实用主义的前科学化操作	(22)
知识社会学的批判	(24)
价值命题 B: 只有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才能 提升政治科学的合法性	(27)
释读经典的原则	(27)
观念实践的个案	(29)
评价的理性标准	(32)

第一编 政治科学的学科论

第二章 政治学从一门学科上升为科学的合法性	(41)
一 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条件	(41)

科学的客观规定性	(41)
学科成为科学的条件	(45)
二 反对政治学是科学的论据	(49)
政治行为的主观性	(49)
政治行为的价值性	(50)
政治行为的规范性	(52)
三 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的理由	(53)
思维水准与学科差异	(53)
科学性与主观性	(57)
科学性与价值性	(60)
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63)
科学性与统一性	(65)
第三章 政治科学知识的制度化	(69)
一 政治学知识整体化的实践基础	(69)
政治生活的一体化	(69)
政治思维的规范化	(74)
二 政治学知识走向制度化的过程	(76)
政治学知识制度化的条件	(76)
政治学知识制度化的过程	(82)

第二编 政治科学的范式论

第四章 政治科学元理论分析	(89)
一 学科元理论的实质	(89)
元理论是理论的理论	(89)
元理论、理论要素与理论范式	(91)
二 政治科学的元理论	(92)
个案分析	(93)

第五章 政治理论构成要素分析	(96)
一 政治理论中包含的基本要素	(96)
二 政治理论史与政治理论要素	(101)
第六章 政治理论范式分析	(106)
一 政治理论范式的实质	(106)
库恩与理论范式	(106)
理解政治理论范式	(111)
二 政治理论范式的类型	(115)
规范性政治理论范式	(115)
实证性政治理论范式	(117)
理性政治理论范式	(119)
三 政治理论范式的转换——实例分析	(121)
实证性范式在广义的行为主义政治理论	
学派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	(121)
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实证性理论范式，在经过一	
段时间的发展后，开始转向理性的理论范式。	
这种新的理论范式又称为“后行为主义”	(129)
西方政治理论在理性的范式取得发展以后，它又	
再一次向规范的范式转换。当然这种转换不可	
能是重复原来的规范理论，而是产生出更为新	
颖的规范理论，这就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理论	(132)
小结：政治理论范式与政治科学体系	(137)

第三编 政治科学的方法论

第七章 政治科学研究的方法基础	(143)
一 政治科学中理论与方法的统一	(143)
政治科学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关联	(143)

政治科学研究中认识方法与逻辑方法的 关联·····	(146)
政治科学研究中方法与技术的关联·····	(150)
二 政治科学研究中历史——辩证的方法论·····	(152)
政治生活是人类的自然历史过程·····	(152)
政治生活是在曲折中演进的过程·····	(153)
第八章 政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155)
一 政治科学研究的传统方法·····	(155)
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	(155)
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制度方法·····	(160)
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170)
二 政治科学研究的现代方法·····	(185)
政治科学研究中的结构功能方法·····	(185)
政治科学研究中的系统方法·····	(190)
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模拟方法·····	(195)
第九章 政治科学研究的技术手段·····	(204)
一 研究课题形成与设计的技术·····	(204)
二 调查研究的技术·····	(205)
三 实验研究的技术·····	(206)
四 对策研究的技术·····	(207)
五 规范的技术与实证的技术·····	(208)
六 定量分析技术和定性分析技术·····	(212)

第四编 政治科学的范畴论

第十章 政治科学范畴的功能、体系与类型·····	(221)
一 政治科学范畴的性质·····	(221)
经验性与先验性·····	(221)

本体性与认识性·····	(222)
二 政治科学范畴的功能·····	(225)
有效地观察政治现象·····	(225)
合理地解释与理解政治现象·····	(226)
科学地预测政治现象·····	(227)
三 政治科学范畴的特性·····	(229)
明晰性·····	(229)
类别性·····	(230)
类比性·····	(231)
可靠性·····	(233)
四 政治科学范畴的体系·····	(233)
范畴体系的构成原则·····	(233)
政治科学的初始范畴·····	(236)
五 政治科学范畴的类型·····	(242)
标准的争议·····	(242)
范畴的谱系·····	(243)
六 政治科学范畴的发展·····	(246)
政治科学范畴发展的条件·····	(246)
政治科学范畴发展的方式·····	(247)
第十一章 政治科学主要范畴选析·····	(249)
一 政治关系·····	(249)
政治关系的起源·····	(249)
政治关系的更新·····	(251)
二 政治权力·····	(253)
概念的分析·····	(253)
公共权力的维度·····	(260)
三 政治系统·····	(272)
政治系统的性质·····	(272)

	政治系统的发展·····	(275)
四	政治制度·····	(281)
	权力资源的组织化·····	(281)
	现代政治制度分析·····	(283)
五	政治体制·····	(284)
	政治组织交往的格局·····	(284)
	意识、规范与动态性·····	(285)
六	政治文化·····	(287)
	习得的观念·····	(287)
	知识增长的诸方面·····	(290)
	后记·····	(297)

导论 政治科学的基础理论观念

第一章 政治科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传统与结果

一 政治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

政治科学在其起源时就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分析、执着的价值追求和严密的社会规范论证。从古代到近代的三个轴心发展时期，政治科学的理论研究都坚持以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作为其理论支撑，并由此形成政治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哲理性、价值性和社会性的优良传统。19 世纪 40、50 年代出现的政治理论的革命同样是在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变革的基础上发生的。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在经过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专注行为、避谈价值和脱离社会的狂躁，从而偏离传统的路线之后，到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后又以新的形态回到了传统的路线上来。

古希腊的形式理性

虽然同属于人类的知识体系，但政治科学明显地不同于文学，也不同于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它要求思想家们把整个政治生活作为一个渗入于社会的、理性的、伦理的细胞之中的巨大、细密、完整的有机系统来看待。在政治生活中，活动着的既有政治家，也有政治学家，但他们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政治家是这个巨

型系统的建造者、修补者、变革者和重建者，他们时时刻刻在尽力地或者构造现实的政治生活框架，或者不遗余力地毁坏之。政治学家则不同，他们站在已建成的政治生活系统的外面或寄身于其中，专门对面前的政治系统进行评价，并努力去设计新的图式。政治学家的工作主要是评价、规定建构原则和为未来的政治家提出忠告，劝告人们特别是政治家们只能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创造政治生活，并建议他们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政治学家的目标在于追溯与思考历史，并立足于现实，努力描绘出未来的人们所要生活于其中的尽可能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样式。

在这一意义上，政治学家的著作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写给同时代的政治家看的，而是为新一代政治家和下一代的政治家预留的，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了解已经成为历史、不可能完全保留下来，但可以通过政治学家的著作再现出来的政治生活及其形态，并试图规训后人从事合理的政治实践。政治科学的这种特点与目标，要求政治认识、政治知识的体系具有哲理性、价值性和社会性。政治科学的这一特点在其起源时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后来则发展成为一种传统。

政治认识和作为这种认识成果的政治科学的知识体系究竟在哪一个文明民族中最先产生，这仍旧是当今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们尽管可以花费毕生的精力去考证并围绕不同的观点进行争论，但能否最终得出一致的、大家都认可的结论是很成问题的。其实这并不太重要。因为人们所要弄清楚的不是政治科学起源的确切地点，而是其产生的条件。包括政治科学在内的任何一门科学，决不是从一个区域或一个民族中一下就产生出来的，而是在一个或长或短的，由多个民族的文化相互撞击、渗透的过程中才孕育出来的。

从迄今为止人们对政治学说史或政治理论史的研究来看，有

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即作为科学形态的政治科学，它最初只是以个别零乱的知识存在于一些比较早地进入文明行列的民族文化之中。随着民族之间不断的战争、吞并、聚合，各种民族文化开始在交流、碰撞中走向协调与融合。与这种不断进行着的文化融合相伴随的是零碎的政治学知识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从人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最初形态只能比较早地包含在古希腊的文化之中。但是，大部分的政治理论史著作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只是简单地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已知的事实来提及，而没有深究下去——为什么政治科学的早期体系在古希腊文化的母体中而不在其他文化的母体中孕育诞生？这种表面上的偶然性的后面有没有必然性呢？如果有，它又是什么呢？

人类作为一个类，其政治生活的历史同它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相比较，显然要短暂得多。人类有相当长的时间是生活在没有政治关系的社会之中。除极少数的思想家将政治看作是与人类共存亡的现象以外，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倾向于将政治生活同阶级、国家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在社会出现阶级分裂并产生出国家之后，人类才被纳入到真正的政治生活的领域之中。

当然，从无阶级的社会到阶级结构十分严谨精致的社会，从只具有道德权威的公共管理机构到具有公共权力与权威的暴力机关，其间肯定经过了十分漫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人类的生活由一种感性的、野蛮的和谐性逐步走向理智的、文明的秩序性。不管后来的史学家们、乌托邦主义者们怎样夸大血缘部落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和谐性，我们仍然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从“无政治”社会或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向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生活的社会的转化，这肯定是人类的一次巨大飞跃。这种飞跃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高上，而且还体现在人类在政治关系中时刻都要受到一定的规范性、秩序

性的约束上。

问题是政治生活并不是从社会之外由非人的力量强加给人类社会的，只有虚幻的神学政治学家才会坚持这种看法，政治生活归根到底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并不断加以发展的产物。阶级的出现并由此而产生出国家，这种变化，从一种角度来说恶，因为它破坏了原始状态下人们之间的平等与公正；但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它恰恰又是一种善，因为它使人类走出了愚昧，步入了文明。

虽然霍布士以及相当多的政治学家都赞同关于国家起源的“契约说”，这一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强调人类在处理社会关系时理性因素的作用。当然这一学说从整体上来说并非是完全科学的，但是，就人类创造国家机器这一点来说至少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它表明人类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规范的、逻辑的思考。人类要真正认识并不断完善自己所创立的国家机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生活也必须依赖这种理性的思维。就这一点来说，作为人类认识的一个较为高级的门类的政治认识，作为人类知识体系中一个较为哲理化、逻辑化的组成部分的政治知识，从一开始就具有哲学的、逻辑的、规范的特征。

正像一切知识都是对与这种知识相关的客观现象以及过程的反映，从而它总是落后于现实的关系一样，人类在形成最初的政治知识之前——更不用说在形成政治知识的体系之前——早就生活在政治关系之中了，他们早就在进行某种政治生活方式的生产与再生产了。从现今的历史记载来看，至迟到公元前 500 年，在黄河、长江两岸，在印度河流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冲积平原，已经出现了范围较大、制度较为严密的国家。

与这几个政治中心相适应的，还出现了当时人类三大文化相鼎立的局面：在黄河流域，产生出以孔子、孟子思想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在印度河平原，产生出以释迦牟尼的思想为代表的印度

文化；在地中海边缘，则产生出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化。但是，在这三种几乎同时走向繁荣的文化中，前两种文化虽然也包含了某些政治知识，但并没有孕育出为后世所公认的政治科学的最初完整形态。政治科学最早的发祥地是古希腊文化。这似乎是个偶然的现象，不少人也试图用偶然性来加以解释。其实，正如一切偶然性中都深藏着必然性一样，在当时的情况下，人类只能在古希腊文化中创造出政治知识的最初体系，而古希腊文化也必然会孕育出政治科学最初完整形态。

古希腊文化是从古代中东文化的一个外围支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公元前 1700 年左右，北方的部落开始向印度河、尼罗河入侵。这些具有共同语系即印欧语系的野蛮人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印度河流域，摧毁了那里的文明成果。接着，他们又同中东地区的部落一起，征服了当时文化已经极为发达的古代埃及。最后，这批勇敢的征服者在因有雅典而出名的阿蒂卡地区和伯罗奔尼撒小岛上定居下来，印欧语也就成为希腊的早期语言。

这场部落之间的残杀与征服，虽然造成了物质财富的破坏和大批人员的死伤与流离失所，但它的积极方面却是主要的，它导致了人类不同地区早期文化在中东地带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碰撞和融合，不同文化实现了统一。与这一多种文化相统一的过程相伴随的是政治生活的统一。

就在波斯人创造统一政治制度和统一文化的时候，在其西北边疆出现了一连串小小的希腊城邦。这些小城邦的文化中有许多因素和成分是从中东的统一文化中吸收过来的，当然这种吸收是一种扬弃，是一种对精华部分的吸取。正是中东文化的精华培育出了希腊的城邦文化。但是，这种从中东文化外围的支流文化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城邦文化显然又具有自身的特质。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乔治·霍兰·萨拜因在谈到古希腊文化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在古希腊人的文化中包含着一种信念，